

道德教育面临很多问题，但追根溯源还是文化问题。文化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

戚万学 等 / 著

只有从文化的视角关注社会问题、审视自身缺欠，道德教育才能真正正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大潮中把握方向，焕发张力，担负起应有的文化使命。只有从文化的视角审度道德教育，才可能对道德教育的诸种特有现象与时代问题，对道德教育的未来走向有一个相对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MORAL
EDUCATION

戚万学 等 / 著

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

DAODE
JIAOYU
DE
WENHUA
SHIMING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王 磊 李宗喜

版式设计 沈晓萌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戚万学等著. —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41-5338-8

I. ①道… II. ①戚… III. ①品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126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543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9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280 千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

(代序)

戚 万 学

举凡社会的重大变革和转型时期，总会伴随文化上的论争，存在文化上的困惑与取舍，甚或说，文化上的困惑与争论本身就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反思一个世纪的学校道德教育的困顿与追求，对学校道德教育而言，文化定位、文化选择、文化取向乃至文化重建的焦虑一直都是自觉自为的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意义上的困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层面的问题迅即凸显。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焦虑和困惑愈来愈清晰，也愈加显著。对这些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不仅关涉文化自身的建设，关涉社会转型能否取得成功和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我国社会转型的理论自觉，也关涉当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从最核心的层面展示和引导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与价值指向。因为，文化的内核——精神价值观与道德、道德教育具有本体意义上的联系，精神文化的变革直接影响甚或主导着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变革。对于伦理建设和学校道德教育来说，从文化角度的审视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百年以来，文化发展中的危机和困惑数不胜数，关乎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讨论也层出不穷，这些困惑和思考为学校道德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提供了直接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源泉。直至今日，一些文化上的困惑依然存在。在此，笔者无意对我国的文化脉络和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盘点，只想指出，对学校道德教育而言，精神、文化上的困惑是当前道德教育的最大困惑，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的危机乃是道德教育最深层次的危机。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目前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正面临以下困惑和难题，这些难题能否得到有效的破解，学校道德教育能否作出合

乎历史和逻辑的文化选择,将是制约未来道德教育改革成效的关键。

一、文化路向的迷失与重建

基于道德与文化之间天然的、本体意义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道德和道德教育的价值理想体现了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其具体内容也反映了某种文化类型所要求的人伦规范。或者说,作为生活样式、生活范型的文化,从更上位、更宽广、更基础的层面,对道德和道德教育具有引领、规约和协调作用,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也势必从根本上规约并引导着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的路向和谱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变更,文化谱系发生紊乱,而新的作为引领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系统尚未得到整合与重建,新的文化路向并不十分清晰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伦理建设,还是作为个体的道德选择,进而作为有明确目的性、方向性和系统性的学校道德教育则必然面临方向性的迷惑。因而,从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困惑之宏观层面来看待学校道德教育,审视遭遇文化路向迷失的学校道德教育到底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传统社会,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文化路向比较清晰,大体上在儒家文化的框架内(尽管儒家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运行,并从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人文理想与文化追求。在近代以来外域文化的冲击和急剧的社会转型条件下,儒家文化遭受重创,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源性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发展脉络被打乱,直至今日,历经百余年来的冲突与砥砺、实践与选择,单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在专业的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领域,可能还远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应有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我们依然盘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一系列文化冲突的困惑与纠缠中。一般来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两次重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佛学传入中国,第二次是近代西学的引入。然而,与佛学的影响相比,近代以来的西学冲击影响更大,中国文化的调整和回应并没有像第一次融合那样取得成功,后一次的文化转型仍然是尚在途中。我们安身立命的文

化之根究竟何在,到底以什么为根基整合陷入混乱的文化,又该如何整合等,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文化路向是否清晰不仅表明了国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事关国人的特质或国人特有的文化和精神追求,而且,对中国的教育、道德教育来说,这种文化路向的长期困惑和模糊,其致命的危害就在于,它可能使学校教育失去应有的文化敏感、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自主性与生命力。文化的空场其实意味着教育灵魂的缺失。或者说,设若不立足于对文化发展、精神文明的脉络及其现状的把握,不着眼于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则既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范型,也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新的可以依赖的文化范型,其结果只能是:文化要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完全依托于政治,以政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来代替精神世界的生产,要么就是回绝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和文化精髓,而一味沉沦于道德教条的传输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诚然,人们也在用各种新的层出不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传统,检讨当前的文化状态,并力图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作出新的诠释,但从系统的文化脉络、深层的文化根基和方向性的文化重建的意义上自觉考量学校道德教育的追求和变革,却并不多见。这样,道德教育应有的文化品位、文化追求和文化路向就被遮蔽了,在实践中,则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技术化、空壳化、相对化、外在化,既不能培养精神丰裕之个体,也不能承载传承文化之重任。

笔者认为,在时代发展所高举的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在社会、个体、教育都在重新审视自我并找回自我的大背景下,文化路向的选择或重建,对学校道德教育来说乃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当然,对于文化的重整,尤其是重建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化路向这样一个艰深的社会性的重大课题,并非一时一事之功。它不仅需要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巨大勇气和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同时,更需要从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汲取养料,以时代的变革作为土壤和支撑,创新性地进行实践的检验与尝试。如果要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确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话,现代化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是未来长时间内的努力方向。“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

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①对于这一点，尽管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如认为西方的发展证明，现代化本身存在各种问题，已经过时了，现代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等。然而，尽管现代化并非尽善尽美，尽管文化上的现代化比器物、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加复杂和艰难，尽管历史的逻辑与道德的逻辑未必一致，但现代化却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在心态上、精神上，应该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宗教”^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的文化、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现代生活的根基之上，现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探讨文化发展路向的基本前提。^③ 正是这一基本前提，才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必须实现且必须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否则，就会在全球化、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中国的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应无助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④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才是人们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中国现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根基，以现代文化及其所蕴涵的价值观为根本指向，应该是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的努力方向。不过，一系列需要解决的课题也接踵而至。比如，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普适性的还是特殊性的？如何看待现代文化和价值观的利弊？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回答的时代性课题。

二、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新生

如果说文化路向的选择与重建主要是指向未来、解决新时期的文化认同，抑或如何重新塑造自我、文化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那么，文化传统的追溯和承接则要回答的是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曾经怎样走过的问题。展望未来，进行文化路向的抉择固然迫切，但能否以清明和理性的态度面对自身

①②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自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

③现代道德、法治可以建立在现代生活之上，现代生活是其根基，而不是原始传统。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29.

④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

的文化传统,进行基于传统之上的清理和开掘,同样也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信心。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些文化传统既蕴涵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标志着我们的文化根性,也是我们以后继续选择、寻找和创造新的自我的前提,离开了这些前提和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继后的创造就会变成无根的游离和漂泊。“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①文化的重建,“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②。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不只是静态的存在或已经流失的符号,它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动态的生活,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绵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拒绝,也无法彻底拒绝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精神价值的内核层面,它无时无刻不环绕我们周围,发挥着某种隐性的规范作用,支配着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精神及其发展模式。

可是,回顾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历程以及相应的文化和教育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在列强入侵、中西文化落差、传统积弊彰著、富国强民的救赎心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激进主义思潮时时登台亮相,甚至于在长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思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极为偏激、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另起炉灶,再造另外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更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文化传统的割裂或淹没,致使儒家文化所积累的道德资源几乎丧失殆尽,“儒家思想在 20 世纪的中国虽然一方面受到知识分子的不断攻击,另一方面在最近四五十年间更因民间社会被摧残殆尽而逃遁无地,但是人的集体记忆毕竟不容易在数十年间消灭干净,这个集体记忆便成了儒家道德意识的最后藏身之地。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长期积累的儒家道德资源到今天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一直是一个加速浪费却不曾增添新的储蓄的局面”^③。诚然,我们文化传统中有一些劣根性的、违背人性和负面的东西,对这些东西

^{①②}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29, 430.

^③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46.

应该予以抵制、排斥、清理,但无论从伦理、审美还是其他文化向度上,中华文化传统对社会权威的认同,对整体利益的关切,对和谐及宽容的追求,对个人需要和个体价值的谨慎态度以及所达到的心灵自由、精神高度和人文理想都令世人慨叹,并展示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随着世界整体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华文化日益散发出光芒夺人的历史魅力,显示出对于全人类的独特贡献。激进主义的观点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模式把传统与现代置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位置,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化心态中,异样的声音基本被淹没,我们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契合时宜的改造与重组、丰富与更新,而是简单地移花接木,其结果是,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被人为地割裂,传统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和继承。失去了对传统的自觉体认和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就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自我。考察百年来的学校教育和道德教育,对待传统伦理、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与旧的世界、传统决裂成了人们的基本共识;认为新的世界应该有新的活法;主张应该用那些外来的、代表了“先进”文化和更高级文明的伦理和道德观念来武装学生的头脑;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再造一个新世界的主人。在急切的现代化心态中,文化、精神领域也自觉和不自觉地沿用了技术领域的逻辑,忙于接轨和赶超。一方面,忽视了这些“先进道德”是植根于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土壤之中,所以,我们拿来的似乎总是皮毛和空壳,无法真正生根发芽,更谈不上枝繁叶茂;另一方面,忘记了对我们自身的那些正面的、积极的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资源的挖掘和培育,甚至一味排斥,导致我们的文化生命日渐枯萎,从而失去我们的价值根基。事实上,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使得我们记忆连贯,而且时时提示我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在现代教育、现代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设若舍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就会产生一种异乡漂泊的无助感。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在拒斥传统、颠覆文化谱系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就愈难以找回自我。

在教育、道德教育领域,究竟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尽管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经历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数次的激进主义浪潮,尤其是经历了并不成熟和稳健的现代化的初步洗礼之后,我们再来审视那些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曾经集赞誉为一身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不得不以更理性、更健全、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反思我们对待传统

的态度以及在割裂传统后我们正在尝受的一切,真正把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作为考量一切伦理和教育问题,谋求教育、道德教育现代化之不可回避的维度。这就意味着,道德教育改革或者道德教育的现代化绝不是与自身文化传统、文化谱系的彻底断绝或革命,它一定是植根于自身文化脉络中的再造,新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一定自觉地打上文化传统的因子,是自我的文化生命的延续和成长,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调整,而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道德教育的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变革,是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而是渐进的,并且,这种文化承袭也只能通过文化的手段即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浸染和生活实践的锤炼,而不能依赖其他的手段,如政治的规训、技术的操练等。另外,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或者坠入复古主义的情结中一味地美化传统,如何赋予文化传统以新鲜血液,使文化传统获得新生,更是一项横亘世纪的大课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对传统作出新的更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需要的解释,或者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作结构性的调整和变革。所幸的是,相关的探讨和尝试已初现端倪,比如返本开新说、创造性转换说、转换性创造说等。在文化和教育实践中,经典和传统又逐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个体心性修养、道德操守的层面,儒家文化又逐渐受到重视;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明及其文化传统也别开生面,从一味遭受指责和鄙视到开始赢得人们的尊重……无论如何,问题已不在于要不要传统,而是如何要的问题,如何使传统获得新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化的缺陷日益彰显,人们也亲身经历了现代化带来的福祉和苦痛之后,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还是显示了独特的或者说永恒的魅力。也因为这样,尽管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承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但在伦理和在道德教育领域,我们还是充满信心。我们要在树立道德教育的文化本土品格,找寻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以及确立新的文化立场中确证我们自己道德教育的文化合理性。

三、文化多元化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并非铁板一块,在文化生态上也展示出来了多样性与丰富性,但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无论在民间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据着无可撼动的正统地位,其他文化样态要么被儒家文化所涵化,要么在总

体上处于被遮蔽、被压抑的边缘。近代开启的社会转型使得儒家文化居于一尊的格局被打破,各种文化风气、思潮和社会实践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孕育了新的文化丛林。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促成了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在思想学术、日常生活等层面上,那种一元主导、独霸天下的文化格局一去不返,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如果说,千百年来的文化总是彰显着一枝独秀,那么,“当今文化真正进入了一个众生喧哗的部落时代”^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多元文化的出现,无疑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标志着人类在自主、自由和自觉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多元文化的浮现也给教育,尤其是直接指向人的精神成长、价值选择和现实的道德教育以新的生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氛围和前提下,真正的教育才成为可能。否则,教育就不是在解放,而是在封闭;不是在启迪智慧,而是在压制思考;不是在鼓励创造,而是在禁锢头脑。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多元文化的生成在给社会和教育制造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譬如文化多元化的边界何在?如何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扰?如何在多元文化之间寻求统一?多元文化给社会伦理以及当前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带来了哪些问题?对于学校道德教育而言,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多元文化给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带来的影响?应该持守什么样的立场来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和教育?在多元文化环境之中,学校道德教育到底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这样的作用?等等。“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代各种文化和教育的所有层面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创造性地对付多元的世界观和视角彼此相撞而产生的强大的影响。”^②这些问题都是自觉自为的学校道德教育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中所必须加以正视和回答的。

文化多元化是阻挡不住的世界性潮流,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国内外理论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反对和敌视文化的多元化,认为文化之间不应该同台登场甚至平起平坐,那些劣等、次要、落后的文化应该服从于优等文化的领导,甚至应该

^①陈晓明.思亦邪——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第四辑)[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55.

^②[美]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M].刘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31.

予以清除，应该继续坚持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文化多元化是文化走向没落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文化和民族优越论的价值倾向。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和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既是既成的事实，也是未来的大趋势，但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将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再信任甚至无法沟通，文化冲突和不可协调不可避免，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对立和争斗将主宰整个世界，世界将陷入由文化的分裂而带来的分裂和痛苦之中。持该观点的人要么从过分悲观和片面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差异，要么就是仍然存在单一文化至上论的情结，无法以平和、冷静和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异己的存在，比如持“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还有一种观点从乐观的、积极的角度看待多元文化，并支持和推动文化的多元化走势。所谓积极、乐观的态度是指认可并肯定多元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不能仅从悲观、负面的角度来评价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间确有差异和隔阂，但也有互补、互鉴和共通的一面，有着可以对话和共同繁荣的一面，完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笔者原则上支持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就目前的形势看，回避或抵制多元文化的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文化多元化是历史的发展大势。事实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交流与对话同在，正是不同文化间的互相碰撞、渗透，互相催生和激发，才造就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和现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只是被动的承载者、偏执的追随者，更应该成为自身所秉承的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理性的思考者、审慎的批判者，成为超越某一种文化从更长远、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大写的人”。今天的人类智慧已不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在尊重与鼓励多元、倡导个性的基础上，寻求最起码的共识、合作和互惠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不遵循一个允许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与集团之间相互沟通的普遍主义原则，就不可能有多元文化的社会。”^①在明了了这一基本的判断或立场的前提下，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无论是对于促成健康、良性的多元文化环境，还是对于启迪和引导个体的文化选择，学校道德教育都是大有可为的。首先，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树立开放、宽

^①[法]阿兰·图海纳.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 狄玉明, 李平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27.

容的心态,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胸来审视形形色色的文化样式和价值需要,以多种方式来展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鼓励学生作出自己的选择,引导学生反省和确认自己的文化归属,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个性。必须反对一刀切或人为地将文化和价值等级化的简单做法,真正告别各式各样的“中心主义”——种族、民族、性别、阶层、职业、年龄、区域中心主义等。此外,还应该以温和的、理性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尊重,欣赏不同的文化,寻找文化的共性,学会如何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友好相处、取长补短。或者按照美国学者斯维德勒的观点,在多元文化中,作为学校道德教育,十分重要的是要发展学生的“深层对话”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深层对话,“简单地说,就是进入其他视角并相互改变地重返自己的视角”;批判性思维,“简单地说,就是将我们的无意识假定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以便我们能理性地对它们进行反思和取舍,根据每个论断的具体背景确切地了解其真正意指是什么”。二者“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因此,它就需要渗透在教育的认知的、语言的、道德的等所有方面”。^① 可见,在多元文化时代,学校道德教育的重心和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转变:由强化单一的价值观念转向多元价值观的共生、互惠,由培养某种道统的批量标准人格转向个性化的自我,由封闭的训练转向开放性的思考。

四、文化殖民的压力与自省

按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在世界步入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仍然没有停止,并事实上造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文化殖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②他们认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如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经济和力量优势主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传输和同化,或者发展中国家出于加速现代化的谋划而不得不对来自先进国家的文

^①[美]L. 斯维德勒. 全球对话的时代[M]. 刘利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30.

^②[美]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0,454—455.

化自动缴械,进而丧失文化和民族自信心等,还是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都是不可避免的逻辑事实。具体来讲,在全球交往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事先制定好的符合发达国家利益需求的规则和价值观、审美观来行动,发达国家则通常把这些规则和价值观美化成全世界通用的普适规则和价值观。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则常常由于自卑、盲目和认识上的模糊等原因,对这些规则乐此不疲地全盘接受,以至顶礼膜拜,从而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个性发展的原动力,最后在文化上沦为发达国家的精神奴隶,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发达国家的牺牲品。“世界历史中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力量与思想上的干预,像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一样。……我们总的来说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我们真正(与强加给我们的相对而言)的文化属性是什么的问题上感觉如此支离破碎,被如此贬低或完全抹煞。”^①这样,发达国家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新的统治者和吸血虫。而这种新的殖民较之传统的殖民形式更加可怕,它不仅兵不血刃就获取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亦使弱势群体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斗志,永远丧失了发展的可能。

文化殖民理论一经提出,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姑且不论文化殖民理论的是非曲直,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处于经济、科技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比较起来,其文化输出的成分更多一些,世界通用的各种标准和规则无疑也是发达国家先期制定的,在许多国家也的确存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的潜规则和集体无意识。“站在 21 世纪门口的绝大多数民族,完全有理由担心,操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手中的全球化力量,终将并且已经成为他们推行新型殖民主的新式武器。……人们不能不承认,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必将成为美国化,成为按美国意志塑造全球的运动。”^②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进行快速的现代化转型,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的大家族中,但是,对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和提示,再来反思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就不难发现,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审美层面的态度,还是值得推敲的。在西方强大势力的推动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

^①[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0,454—455.

^②庞朴.文化一隅[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330.

化席卷全球，从衣食起居到人际交往，从生活方式到语言表达，从科技和制度到价值和审美，西方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人们的身心，“西方的就是最好的”，“民族文化就是落后的代名词”，那种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一味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现象屡见不鲜。在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中，民族的、传统的成分越来越稀薄，各种媒体、宣传机构都在极力渲染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普适性，来自大洋彼岸的风吹草动都被青少年奉为时尚而崇拜有加；在家庭教育中，鼓励孩子留学或到国外去工作，尽早除去民族和传统的面纱，以早一日步入“现代文明人”的行列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在学校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中，对外来文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照搬有余，而本土化的改造、适应与承换则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殖民——文化殖民的压力，可能并不为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少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经济、科技的全球化逻辑并不天然地适用于文化，文化应该有自己特有的逻辑和追求，所以，在积极响应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必要的文化自觉、自省和自立就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基本任务。对我国来说，文化自觉的任务也显得十分迫切和繁重。

所谓文化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也就是说，文化的自觉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和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而这一点，既不能通过文化回归也不能通过全盘西化或他化的方式来实现，而是要对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它的规律与特点，它的优势与不足，它在世界多种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全面的把握，对其他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能吸取其精华。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其普遍性、普适性的一面，全球化把世界变为一体，也理所当然要求世界享有包含伦理、法理在内的最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公共准则，同时，西方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作出的表率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等同于世界，西方的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最好的价值观。那种试图站在闪电之城来统率

^①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世界、为人类提供标准和楷模的思想不过是一相情愿。所以，面对现实中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面对民族文化可能被同质化的危险，面对新的文化殖民，道德教育领域的文化自觉一方面固然继续以开放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来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故步自封、我族为大、各自为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应继续站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之上，接受全世界文明的洗礼和冲刷，才能博采众长，永葆青春；但另一方面，更要树立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要始终确信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和本土文化特色，就等于失去了自我。民族虚无主义同样是不可取的。另外，还必须确立一种信念，即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道德教育的改革，要始终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实践，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最终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肯定要融合和吸收各种域外的因素，但外来文化只能是强身健体，为我所用，而不可全盘照搬。在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中，人们已从理念、课程、策略与途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但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似乎还未作正面的回答，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培养和能够培养什么样的道德人格？具体来讲，在全球化带来的强势文化挤压下，道德教育的目标除了要培养世界人、个性化的自我之外，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才能赋予道德教育改革以实质性的内容，而只有具备充分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才对此问题作出合理的思考。

处于不断变革的社会大环境中，文化自身也是荆棘丛生的迷宫，不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以上只是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当前中国学校道德教育面临文化困惑或文化上的难题：文化路向的叩问旨在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它既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也来自对文化传统和当前文化境遇的厘定；文化传统的追索旨在从纵向的、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的碰撞主要是从现实的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化殖民的压力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正在遭遇的困惑。这些文化上的困惑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 21 世纪学校道德教育必须解决的基本文化课题，在经历了百年的文化冲突和嬗变之后，学

校道德教育作出清明而合理的文化自觉就成了人们的共同心愿。毕竟，道德教育并不只是现有文化和社会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它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